

高君宇傳

牛崇輝 王家進 ●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高君宇遺像

高君宇，原名高尚德，字锡三，1896年10月22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原属静乐县）峰岭底村，1925年3月6日因病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时年29岁。

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之一，曾任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活动家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一生仅度过了29个春秋。但在短暂的一生中，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理论工作，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积极奔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序

曹中厚

青年学者牛崇辉、王家进撰写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高君宇传》一书，是一部系统研究我党早期党员、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山西党的创始人高君宇的专著，也是党史界的又一可喜成果。日前，作者将自己的书稿送我，嘱我为之作序。我能一展他们的新著，先睹为快，自然感到十分欣慰。该书不论是在总体框架的构思上，还是在探寻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思想发展轨迹等方面都显示了作者的独到之处。它融科学性和通俗性为一体，比一般的学术性著作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我读后受益良多，很愿意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好书。

高君宇 1896 年 10 月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今属娄烦县），1916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是我国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同志的学生和助手。1919 年参与领导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当时他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带领学生冲入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参加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英勇行动。而且以北京学联代表的身份，先后奔赴天津、太原指导学生爱国运动。不久，他又参加了进步社团国民杂志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和新潮社，并担任国民杂志社编辑、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和新潮社的干事。

1920 年 3 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和邓中夏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过比较系统地学习、研

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高君宇更加坚定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年10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高君宇被选为书记。11月，高君宇参加了由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当时革命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唤醒劳工，改造社会”。高君宇在这方面呕心沥血，奔走呼号，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五四运动”后，他按照“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宗旨，深入到北京郊区的工厂、农村，宣传革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1920年5月1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高君宇发表了《山西劳动状况》和《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等文章，响亮地提出：“要把一切生产机关从资本阶级收归……建设新的组织”，而以“破坏政权”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他和邓中夏等在长辛店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建立了工人俱乐部等组织，积极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呼吁革命的知识分子从事实际的群众斗争。1923年2月，京汉铁路爆发总同盟大罢工，高君宇是主要领导者之一。他和何孟雄、李梅羹等驻守前门车站，与长辛店、郑州及汉口等各站联系，指挥罢工运动。在紧急关头，他又被党派赴长辛店，领导工人同反动军阀进行斗争。“二七惨案”以后，高君宇被反动军阀所通缉，但他置生死于度外，一如既往地活动在工人运动中。在白色恐怖下，他怀着对反动军阀的无比愤慨，撰写了《助军阀残民之总统命令》等文章，和罗章龙合编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并由他作了题为《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的后序，号召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同反动军阀进行殊死斗争。

1922年1月，高君宇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和产业工人的代表。会后，

高君宇和其他同志在苏联进行了考察，并参加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切，使高君宇对苏维埃政权有了深刻的认识，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国革命的信心。同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高君宇出席大会，并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高君宇为代表之一，出席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根据高君宇等传达的“远东会议”精神和列宁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会后不久，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创刊，高君宇担任该报编辑、记者，以后还担任中共北方区党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的编辑。此外，他还编辑过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高君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和目标，结合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撰写了大量的战斗性很强的文章，对于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对于推动中国革命，做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

高君宇是中共山西党组织和团组织的创始人。在“五四运动”期间，他协助山西进步青年创办了《山西平民周刊》，广泛传播进步思想。1921年前后，他奉命返晋，帮助、指导建团工作，遂即与王振翼、贺昌、李毓棠等正式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他遵照党的指示，再度回到山西筹建共产党的组织，组建了由李毓棠、彭真、纪廷梓等负责的中共太原小组。

高君宇英年早逝。他是在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斗争中，殚思竭虑，操劳过度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党的“三大”后，他接受党的指示，积极协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他协同李大钊建立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并任市党部总务股主任。之后，他又南下广州，参加了沙面工人进行的反帝斗争。接着，受党的委托，帮助孙中山工作，曾参与组织工团军，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在战斗中英勇负伤。1924年11月，陪同孙中山北上北京后，他带病协助孙中山和李大

钊等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他被推选为代表。由于日夜奔波，积劳成疾，高君宇不幸于同年3月5日逝世，时年仅29岁。

他的一生虽然是那么短暂，犹如“彗星之迅忽”——仅仅度过29个春秋；但他的一生却是那么壮丽，犹如“闪电之耀亮”——光照祖国的大好河山！

正因为如此，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对这位革命先驱充满仰慕热爱之情。毛泽东、周恩来、彭真、邓颖超、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高君宇予以高度赞誉。高石之墓（即高君宇、石评梅墓）所以至今依然耸立于陶然亭公园，正是周恩来、邓颖超多次关怀和保护的结果。邓颖超在《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志》中还讲述了高君宇为她与周恩来当“红娘”的佳话。薄一波曾盛赞高君宇是“革命先驱”；彭真在题词中高度评价高君宇“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现在《高君宇传》的出版，无疑是对这位革命先驱的最好纪念。高君宇一生的光辉业绩和革命精神，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骄傲，也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今后5年和15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指导方针、主要任务以及政策措施，描绘出了一幅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宏伟蓝图。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将以一个更新的面貌进入二十一世纪。

摆在我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我们的前程是光辉灿烂的。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必须遵循江泽民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努力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学习高君宇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积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加快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振我声威，壮我国力，为尽早使我国成为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学习高君宇那种执着地追求真理，认真钻研马列主义的精神，反对任何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倾向，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永远高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旗前进；学习高君宇那种根据党的纲领身体力行，积极贯彻党的决议的忘我工作精神和高度的党性观念，不断增强坚持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的自觉性，努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功立业；学习高君宇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崇高精神，勤政为民，艰苦奋斗，自觉抵制和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和多种腐败行为的诱惑，做廉洁自律的模范，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而不懈努力。让我们弘扬高君宇同志的伟大精神，沿着党的十五大开辟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去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高君宇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1999年1月8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家世.....	1
一、普通的山乡农家	1
二、少年时代.....	13
第二章 在山西省立一中	24
一、品学兼优的学生.....	24
二、忧国忧民的青年.....	30
三、参加反袁斗争.....	33
四、响应护国运动.....	38
五、中学毕业.....	45
第三章 北大读书	50
一、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	50
二、结识李大钊和陈独秀.....	52
三、婉言拒绝梁善济.....	56
四、学生运动的领导者.....	59
五、积极参加进步组织.....	62
六、在“五四”运动中.....	65
七、接近劳动人民.....	79
八、到工人中去.....	84
九、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86
第四章 走向社会	90

一、继续开展工人运动	90
二、在少年中国学会	94
三、工农的朋友	97
四、为在理论上建党而奋斗	103
第五章 远东之行	112
一、赴远东探求革命真理	112
二、列宁会见中国代表	118
三、返回祖国	121
四、组织长辛店工人罢工	126
五、接待苏俄特使	129
第六章 建党初期的理论家	131
一、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131
二、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	140
三、关于革命动力的研究	148
四、对党的建设的理论贡献	158
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探讨	163
第七章 指导山西建党	170
一、山西建党前的形势	171
二、马克思主义在太原的初步传播	174
三、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178
四、引导山西学生广泛开展革命运动	181
五、关心《山西平民周刊》	188
六、摆脱军阀追捕	192
七、帮助山西建党	200
八、离开南下	209
第八章 高石爱情	217
一、石评梅的身世	217

二、石评梅初恋的痛苦	224
三、石评梅与高君宇的交往	230
四、高君宇病逝前后	254
高君宇生平年表	270

第一章 家世

一、普通的山乡农家

高君宇于1912年考入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在此之前，他一直生活在峰岭底村。峰岭底村是个杂姓村，段姓居多，董姓、高姓次之。据高家《家谱》记载，高君宇家来这里定居，是从他的十四代祖先高起、高库、高柱三兄弟从陕西省米脂县逃难来这里落户开始的。相传，高家三兄弟是十七世纪明末农民大起义领袖高迎祥之族人，曾参加过明末农民大起义。起义失败之后，高氏兄弟为避难，从陕西逃到了这里。这个村东依峰岭山，西临汾河水，人多地少，土地贫瘠，自然条件较差，粮食生产不足，但矿藏丰富。在清末明初，村里的少数富户，多数是靠经营小煤窑致富的。多数穷人，则是靠给富户下煤窑担煤、烧瓷卖瓷以维生。

高君宇的先祖逃荒到峰岭底村后，两手空空，困难重重，唯一的出路也只有给富户扛活，当长工，下煤窑，卖苦力，节衣缩食，忍饥度寒，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直到高君宇曾祖父高步山当家的时候，家中才稍有节余。高步山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名九重，字羲良；次子名九章，字世良。高九重就是高君宇的祖父。在清朝政府腐败政治的统治下，贫苦的农民承受着沉重的压榨，不堪忍受。为了摆脱贫穷人的这种境遇，高君宇的曾祖父宁愿全家人多吃点苦，也发誓要把儿子培养成人。他们以家为业，勤俭为本，节衣缩食，供养儿子

念书。高步山去世后，前清贡生张鹤腾在为其撰写的碑文中说：

“莱高公讳步山，父曷乾，李氏生。公昆弟三人，公长，次履山，季深山，世居峰岭底。元配李氏，所生二男，九重、九章，一女适配段门。公未北而父早逝，不暇多学，惟农是务，勤俭为本。与李氏一饭分为再饭，一衣更作两衣，惟恐九重读书之费用不足耳。余久就学于公之堂兄名山先生，与九重同研最久，亲见公之为人，生资诋笃，言行不越规矩，友爱且出天真，甚至横之来亦受之而不报焉，则公之为人亦概可知也。……”^①

由此可见，高九重为人笃信忠厚，“言行不越规矩，友爱且出天真”。他与同窗学友和睦相处，而天资聪慧，学业日见长进。但终因家贫，无力供给学费，高九重只得中途辍学，给地主揽工放羊。然而，由于他学习努力，成绩出众，受到老师的喜爱。老师因为他中途辍学，深为惋惜。为了不至埋没良才，老师主动出资相助，这一义举，深深感动了高君宇曾祖父，他同意儿子继续学习。在老师的热情教导下，高九重信心十足，在学业上格外努力，读完了“四书”和经、史、子、集，并在学业上颇有建树。后来参加童试，他果然不负众望，考中了秀才。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全家人为此而喜气洋洋。但由于家贫，竟在“报喜”的那天，家中因拿不出“喜钱”很是尴尬。“报喜”者登门索要“喜钱”，这在当时是惯例，再穷苦的人家也必须有所表示，这可愁坏了全家。高君宇曾祖母拿出自己平日积攒的几个做针线活的钱也不够，无奈，众亲友东拼西凑，总算凑足一笔钱奉送“报子”。然而“报子”还嫌少，适才还堆满笑容的脸顿时变得十分难看，大家一阵慌乱，但也没有办法，唯恐冲了“喜”，只得耐心加以解释。一些深知高家境况的邻居也七嘴八舌为高家说情，但“报子”却只认钱，不理，气冲冲拂袖而去。这本来是一件大喜

① 摘高君宇曾祖父高步山的碑文。

的事情，却弄得大家怏怏不乐，不欢而散。

高九重考中了秀才，功名虽然不算怎么高，但在落后的山区，也算出了个“人物”，为高家祖宗争得了一些光彩，高家满门为之高兴。有了这个学衔，虽不能说可以扬名声、显父母，但足可以在县里求得一官半职。由于高君宇祖父生性笃厚，不善钻营，与官场无缘，只好在村里当了一辈子塾师。

高九重晚年得子，起名配天，字子明。这就是高君宇的父亲。高配天生于清光绪元年(1874年)十月初三，卒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一日，享年53岁。他不仅在高家是个创业的人，就在当时的静乐县也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开明士绅。因为他是个独生子，从小颇受大人溺爱。他天资聪明，像他父亲一样勤学好问，有旺盛的求知欲。在四五岁时，他的父亲就教他开始读书写字，给他讲《三字经》、《百家姓》，以及《铭贤集》之类的启蒙知识，有时高兴了，还讲些屈原、岳飞和文天祥的故事。每到这时，父亲讲得滔滔不绝，儿子听得津津有味。故事讲完了，高配天仍缠着父亲不放，对于他来说，这些故事永远听不够。故事中那些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和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都在高配天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在高配天七八岁时，他的父亲又开始教他读《四书》、《五经》，后来便送他到私塾读书。高九重望子成龙心切，为儿子的学业费尽了心血，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一个光宗耀祖的人物。高配天本人也颇为用功，常常起早贪黑，发奋学习，进步很快。但由于他天生体质羸弱，常因生病而停学，使学习受到了很大影响。高九重看到儿子因体弱多病不能坚持学习，心里又着急，又心疼，生怕儿子积劳成疾。因为他是高家唯一的继承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将是高家最大的不幸。当时正值清朝政治腐败，列强横行，社会上买卖功名也风行一时，高九重就设法凑钱给高配天捐了个清朝的“监生”，这一来总算有了功名。从此，对儿子的学习也就放松了。

高配天24岁时，父亲去世。他父亲在世时，家境虽不算宽裕，但全家平时节衣缩食，克勤克俭，节存了一笔钱。父亲去世后，高配天很悲伤，良久不思饮食。他想了很久很久，他由父亲，想到了自己，由高家又想到了社会，父亲的一生，“惟农是务，勤俭为本”，却也未能摆脱贫穷的命运。他终于想通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何必苦苦巴巴地守着几亩薄田糊口呢！他反复考虑自己的出路，考虑高家的未来。他想，自己是父亲唯一的儿子，父亲留下的这点家业要靠他来维持扩大，父亲生前希望振兴家业，但到头来还是落了个穷困潦倒。他通过总结父亲的一生，认识到仅在农田上打主意是没有什么油水可取的，父亲教了一辈子的书，也没个出息。既然父亲还有点积蓄，那何不利用父亲留下的这笔银两做一番事业呢！他苦苦品味着父亲临终前的嘱咐，父亲曾向他约法三章：第一，不要做买卖，怕用人不当，丢财惹气；第二，不许开煤窑，恐遭灾招祸；第三，不许打盘（因为这是个投机行当），怕搞不好会倾家荡产。

然而，高配天是个思想敏捷，有远见卓识、有志向的人，他不肯按部就班，让旧观念来缚住自己，他不愿死守父亲的遗教。其实在父亲的心中，怎么不盼望他能有所作为呢？身为人子，孝为本。高配天觉得走自己的路，创一番事业，就是对父亲的最大孝敬，只是不要损人利己，干缺德的事。他想了几天几夜，把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之后，认为父亲之所以“不要做买卖”，是怕“用人不当”，“丢财惹气”，如果自己用人得当，非但不会丢财惹气，而且还能和气生财，说不定是“福”呢！人生一世，如果这也怕，那也怕，前怕狼，后怕虎，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抱着这种想法，他先试着在娄烦镇开了一个叫“天合成”的货铺，当了掌柜，认认真真地做起买卖来了。

这铺子开张第一年，生意还十分顺利，年终结帐，颇有些盈余。乡亲们纷纷来庆贺，都说“时来运转，高家该发迹了”。高配天心中

也十分高兴。由于生意做得顺当，货铺赚了钱，高配天的信心更足了。他认为，虽然买卖赚了钱，但不能坐吃山空，应该扩大经营。他心中开始盘算下一步的发展。他把盈利的钱存入钱庄。经过二三年的苦心经营，确实也积存了一笔可观的资金。他决定扩展基业，开设油房、酒坊、粉坊。果然，天顺人意，经过他的精心经营，这些作坊后来都赚了钱。穷困不堪的高家开始变得红火兴旺起来，给沉寂偏僻的小山村也带来了生机。乡亲们对高配天刮目相看，有人甚至迷信地说：“高家祖辈是好人，老天爷照应”。也有人以“轮回”的佛教观点看待此事，以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高家祖辈受穷，也该发财了。这些认识，充满了落后、愚昧、封建意识，把人生的转折看成了老天爷的慈善，自然掩盖了高配天的胆识和创业精神。创业中的那种酸甜苦辣，只有高配天一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命运是庸人的障碍，是实干家的助手。如果按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勇于创业的优秀企业家。

随着家业的振兴，高家的积蓄逐年增多，高配天的经营范围也在逐步扩大。他不但在村里修房置地，而且添牛买羊，步入了财主的行列，成为县里新发迹的富户。后来他把自己的奋斗历程作过总结，从中悟出一条道理：有志者，事竟成。勤苦在人的一生中是第一位的，只要有勤奋实干的精神，再加上计划周密，精心创业，谨慎行事，事业就一定能够成功。他在家中苦干了几年，攒够了资本，就又在静乐县城内和岚县东村开设了面铺和货铺。

由于家大业大，高配天经常跑外经营生意。他一心扑在了事业上，无暇照顾家庭。高君宇母亲只得一人把家务事承担起来，以免除其后顾之忧。夫妻俩人夫唱妇随，配合默契，日子一天好似一天。尽管高配天已经成为一个财大气粗的“老财”，按理说也该好好享受，摆摆阔气了。但他却一直保持着谦恭朴素的家风。他要求家人勤俭过日子，不得花天酒地，不得抽烟酗酒。但对外要宽宏大量，礼

仪待人。他常以“非礼勿施，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四勿”规范警诫家人。但是，由于受时代的局限，高配天的思想上有着浓厚的封建道德观念，因此他还给家人立了一些清规戒律，诸如“男女授受不亲”呀，“女人不许随便上街串门”呀，等等。这也许是他从小受封建思想影响的缘故吧。但从他主张“廉洁朴素”这一点来说，对其子女的影响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 的传统美德。

高配天是一位淳朴正直的中国人。他为富一方，没有忘记一个中国人应有的道德良心，没有忘记小时候父亲给他讲过的屈原、岳飞、文天祥等人的故事，民族英雄的精神在深深地激励着他，“位卑未敢忘忧国”，在他的思想上，最可贵的是有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清朝末年，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和团举起了“反清灭洋”的旗帜，斗争烽火遍及半个中国，影响波及静乐县山区。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首先赞成义和团运动，逢人便讲帝国主义的罪恶，讲义和团的英勇斗争，对义和团的勇士们寄予了深切同情。辛亥革命兴起后，他积极拥护革命，参加了革命组织同盟会。革命党人号召剪掉象征清王朝统治的辫子，他和两个儿子（俊德和尚德）在静乐县带头积极响应。他痛惜国家不能富强，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憎恶清朝的腐败政治，痛恨世界列强横行国土。他酷爱祖国医学，认为这是古人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遗产，有必要进行发掘、继承。于是在经商之余，他坚持阅读各种医书，渐渐地精通了医道。他虽是县里的一个大财主，但不同于一般的财主，思想十分开明。他按月发给雇工和佣人报酬，对贫苦百姓更有一颗怜悯恻隐之心。平时在村里给人看病，从不多取分文。因此，方圆几十里地的人们都很敬重他，有事都愿来找他商量。日久天长，他的威信提高了。

这样，高配天的为人、品质、才干，在县里就自然而然地压倒了那些为富不仁的大户。人们信任他，官府也对他另眼看待，在官民